学术专论

清修《四库全书》删改问题刍议

——以校办《三朝北盟会编》为例

邱靖嘉

[摘要]　清修《四库全书》对收录之书多有删改，包括改译民族语名和删削改窜违碍文字两种情况，其具体情形比较复杂。在民族语名改译方面，初修《四库全书》时，除辽、金、元三史等个别书已彻底改译及部分书交对音官酌情改译外，其余诸书皆仍旧文未改。至于违碍文字删改，馆臣起初严于明末清初各书，而宽于明末以前书籍。直至乾隆五十二年覆校《四库全书》，删改尺度转严，明确要求全面改译与三史相关的所有文献，并对所见违碍文字进行彻底删改。在此研究中，上海图书馆藏《三朝北盟会编》四库覆校底本体现出重要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　《四库全书》　《三朝北盟会编》　民族语名改译　违碍文字删改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9）－02－0040－12

众所周知，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对收录之书均做了不同程度的删改，有的甚至改得面目全非，完全失其旧貌，历来遭人诟病。此处所谓“删改”，就狭义而言，主要指四库馆臣为避时忌，对前代文献涉及胡虏夷狄等违碍文字肆意进行删削改窜；若从广义来说，则还应包括四库馆臣全面改译辽、金、元及其他民族语名的情况。关于这两方面的问题，前辈学者虽均已有所论述（相关论著详见下文），但仍有一个晦暗不明的问题尚待澄清。一说起清人删改四库文献，我们往往会默认为自四库开馆之初便一以贯之地严格执行，然而实际上，无论是违碍文字的改窜，还是民族语名的改译，当时四库馆臣的处理情形是复杂多样的，并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引起前人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前研究大多依据现存阁本《四库全书》立论（利用最多的是文渊阁本），但这体现的仅是清人删改的最终成果，而无法反映当时操办的具体过程，即便某些书籍今尚有四库馆臣校办底本传世，也因其删改笔迹的书写年代大多不甚明晰而无法完全解释该书办理过程中的变化。不过，幸运的是，《四库全书》所收《三朝北盟会编》有一部明确无疑的四库覆校底本保存至今，结合相关档案资料加以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覆校《四库全书》前后馆臣校办书籍的某些原则性变化，

[收稿日期]　2018-09-12
[作者简介]　邱靖嘉（1985—），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qiujingjia@ruc.edu.cn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19XNB023。

进而对重新认识《四库全书》中的删改问题提供帮助。本文即以《三朝北盟会编》的校办过程及其四库覆校底本为例，分别就四库馆臣改译民族语名和改窜违碍文字两方面问题加以考察，以期说明清人删改四库诸书的不同情形。

一、《会编》四库覆校底本与《四库全书》覆校始末

南宋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系统记载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女真和战史事，多引诏敕、国书、奏议等原始档案及文集、笔记等私家著述，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宋代史籍，清修《四库全书》亦收录此书。今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会编》清抄本，① 被著录为“四库底本”。② 据书前题跋和藏印信息可知，此书原为清乾隆中钱塘吴城、吴玉墀兄弟瓶花斋的插架之物，后转归彭元瑞所有，期间经过吴城、江声、朱文藻、吴玉墀、彭元瑞等诸位名流精校，可称善本。按彭元瑞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至四十八年先后任浙江、江苏学政，他获得这部《会编》即在此时，四十八年十月调回京师充国史馆、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后来他便将此书献为覆校《四库全书》时所用的底本。③ 关于此事，彭元瑞书前题跋做了明确交代：

> 此书经武林吴氏、吴门朱氏传校数过，取证多本，予得之复有增益，世无剞劂，辗转误钞，斯其最善矣。乾隆丁未（五十二年）详校《四库全书》，以此帙为底本，平宽夫、陈伯恭两学士删其偏谬之辞，对音改从《钦定国语解》，重钞入文渊阁者是也。既竟，附志，重阳后七日元瑞并书。④

这一则跋文对于我们了解这部《会编》成为“四库底本”之原委及其文献价值至关重要，需要展开分析，并结合乾隆五十二年覆校《四库全书》的情况加以说明。

清朝编修《四库全书》始于乾隆三十八年，至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第一分文渊阁《四库全书》修成。当时所采用的《会编》底本是“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⑤ 后来相继缮竣的其他六阁全书也应是根据这个底本抄成的。⑥ 直至“乾隆丁未详校《四库全书》”时，彭元瑞才将其新获原瓶花斋藏本贡献出来，“以此帙为底本”，经删改后“重钞入文渊阁者”。这里需要先对乾隆五十二年覆校《四库全书》之始末经过作一介绍。⑦

乾隆五十二年五月，清高宗在翻阅文津阁《四库全书》时，发现“其中讹谬甚多”，于是派随从各员“详加校阅改正”，又“因思文渊、文源二阁所贮《四库全书》，其讹舛处所亦皆不一而足”，遂谕令立即组织人员对二阁全书展开全面覆校，要求“除校出一、二错字即随时挖

---

① 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卷 2 史部纪事本末类，北京图书馆古籍影印室编：《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第 28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第 649 页。此书共 250 卷，67 册，每半叶 10 行 21 字，黑格，典藏号“线善758333-99”。

②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卷 6 史部纪事本末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150 页。上海图书馆在线书目检索系统称之为“四库全书底本”。

③ 关于这部《会编》的校藏历史，参见邱靖嘉：《〈三朝北盟会编〉四库覆校底本考辨——兼论乾隆五十二年覆校〈四库全书〉的操办流程》，待刊。

④ 此跋文又转录于郭立暄等整理：《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选辑·史部》，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 2 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94 页；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 3 史部编年类《三朝北盟会编》条，第 2 册，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56 页。

⑤ 《四库全书总目》卷 49 史部纪事本末类《三朝北盟会编》提要，中华书局，2008 年，第 438 页。

⑥ 参见邓广铭、刘浦江：《〈三朝北盟会编〉研究》，原载《文献》1998 年第 1 期，收入刘浦江：《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95-397 页。

⑦ 关于此次覆校的情况可参见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岳麓书社，2010 年，第 144-147 页；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200-203 页。不过，前辈学者研究主要依据档案缕述其起因、结果，而缺乏对校办流程的具体论述。

改，毋庸零星进呈，如有语句违碍，错乱简编，及误写庙讳，并缮写荒谬，错乱过多，应行换五页以上者，再随报进呈”。① 此次覆校工作于五月二十七日开局，实际由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彭元瑞及总纂官纪昀“总司其事”。② 六月初三日，因监察御史祝德麟奏请，高宗又谕令将《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交武英殿刊刻，利用这次覆校机会，据以系统改译辽、金、元三史人名、地名，称“凡有关涉三朝事迹应行译改人、地名者，自应乘此校阅之际，令校书各员随时签出，挖改画一，自可省重复检阅之烦”。③ 军机处谨遵圣谕，马上酌定校勘章程，选派“部院各官共二百五十余员，两阁各分一百二十余员，专司校阅”，④ 这些人员皆被称为“详校官”。具体来说，当时的校办流程是，详校官需“校出书籍内如有谕旨指出各条”，写于黄签之上，“凡各员校勘之签，均由彭元瑞等覆看一过，送交永璇、刘墉、金简，另派妥员登记册档，挖改后再行照档销签”。如果签出者只是一般性的常见错误，则照此例行办理即可，若“非寻常错误者”，包括上谕所谓“错乱过多，应行换五页以上者”，“即行随报进呈”，另作区处。⑤ 这就有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其一，对于大多数书籍而言，应改动之处数量不多且为寻常错误，则只需在两阁正本中径直挖改即可；其二，如若某些书籍谬误甚重，有待进行大幅度的删改，超乎寻常，则不适宜直接在阁本上操作，而要先删削其底本，再据以改订阁本。

因《会编》有二百五十卷之巨，且专记宋金和战史事，对满洲先祖女真事迹记述甚夥，语涉违碍之处俯拾即是，而此前编修时并没有对《会编》做什么改动（说详下文），这种情况非比寻常，显然无法由详校官随文签出挖改，而只能先在其底本上进行全面删削改窜。由于四库馆对书籍管理不善，时常发生各书校办底本丢失的事件，故推测《会编》原来的底本“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至五十二年覆校时已遗失，情急之下，主持其事的彭元瑞遂将个人藏本捐献出来，用作覆校底本，命“平宽夫、陈伯恭两学士删其偏谬之辞，对音改从《钦定国语解》”。此二人即平恕（字宽夫）、陈崇本（字伯恭），他们都由清书庶吉士散馆为翰林院编修，预修《四库全书》，其中平恕是一直参与辽、金、元三史改译工作的纂修官，⑥ 此次覆校两人皆在校办人员清单之内。⑦ 两人受命删改《会编》，或许有所分工，可能主要由平恕按照《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译改其中的人名、地名，而陈伯恭负责“删其偏谬之辞”，即处理“语句违碍”问题，他们所做的墨笔删改痕迹皆清晰可见。

不过，根据此次覆校工作章程，平恕、陈崇本对《会编》覆校底本完成初步删改后，需经彭元瑞复核，再送总裁官审定等环节，最后才能登记册档，对四库正本进行挖改抽换。在这一过程中，彭元瑞及总裁官都有可能对最初的删改意见做出修正。加之考虑到此书删改内容各卷分布很不均衡，有些卷因主要记述女真事故删改极多，而有的卷却改动较少，并无必要全部重抄，故最后详校官采用的是以局部文字挖改为主、部分重抄抽换篇页的校办方式，这要求尽量迁就阁本原有的行款进行挖改，为此可能也会不按照底本的删改意见另作处理。因此若比对《会编》覆校底本与今文渊阁本，我们会发现该底本中的许多删削改窜最终并未为文渊阁本所采纳。但就总体而言，文渊阁本所见民族语名改译基本都与覆校底本一致，其对违碍文字的删改

① 《寄谕六阿哥永瑢等文渊文源所贮全书著派科甲出身尚书等校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2004-2006 页。

② 《质郡王永瑢等奏遵旨酌定校勘文渊文源阁全书章程折》，《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2009 页。

③ 《寄谕八阿哥永璇等将武英殿所刻〈三史国语解〉赶紧刊刻完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2020 页。

④ 《质郡王永瑢等奏现办覆校文渊文源两阁书籍事宜折》详言“除臣永〈瑢〉、臣阿〈桂〉各阅看书籍，并天文、乐律、医书专派各该衙门人员阅看外，其余每处各一百二十四员”（《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2010 页）。

⑤ 以上皆见《质郡王永瑢等奏遵旨酌定校勘文渊文源阁全书章程折》，第 2008-2009 页。

⑥ 参见刘浦江：《从〈辽史·国语解〉到〈钦定辽史语解〉——契丹语言资料的源流》，刘氏著：《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 年，第 190-191 页。

⑦ 《质郡王永瑢等奏现办覆校文渊文源两阁书籍事宜折》“附清单一”，第 2013 页。

在很大程度上也的确是以覆校底本的处理意见为基础的。①

据上引彭元瑞题跋可知，文渊阁本《会编》的挖改抽换工作一直持续至乾隆五十二年重阳后七日，即九月十六日“既竟”，期间彭氏藏本一直用为底本。因当时文渊、文源两阁全书覆校有互相知会的规定，故文源阁本《会编》之删改大概也与文渊阁本相同。随后十月，清高宗又令纪昀带人前往热河避暑山庄，全面覆校文津阁《四库全书》。但需要说明的是，此次校阅未能充分吸收文渊、文源二阁的覆校成果。据纪昀禀奏，此行无论是“文渊、文源二阁校正册籍”，即登记造册的所有应改、应删条目册档，还是四库诸书底本，都没有带至热河，无从参考。后纪昀仅要求将“二阁翻译册档”移送一份来，作为改译辽、金、元人地名之依据。至于“语句违碍”问题的删改，实际上文津阁本详校官只能抛开文渊、文源阁本，另起炉灶，重新做删削改窜，若有疑问再遥令驻京馆臣代为查阅底本。② 因此事实上，文津阁本诸书的文字删改与文渊阁本往往大相径庭。就《会编》来说，经笔者比对，两者删改不同之处达 70% 以上，连民族语名的改译也多有歧异。另外，文津阁本对于违碍文字的改窜相对比较宽松，有许多应改应删之处皆被遗漏。如卷二有“盖不欲弊中国怒远夷也”及“历观前代，虽征讨殊类”两句，文渊阁本分别将“远夷”“殊类”改作“远人”“外国”，但文津阁本均未改。又卷三，“本名朱理真，番语讹为女真，本高丽朱蒙之遗种”句，“番语”二字及“本高丽朱蒙之遗种”八字文渊阁本均删去，而文津阁本未删；“驻跸之败，高延寿、高惠真以其众及靺鞨兵十余万来降，太宗悉俾纵之，独坑靺鞨三千人”句，文渊阁本全删，文津阁本亦未删。若将这些文津阁本未删改的内容与《会编》覆校底本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可为我们研究四库删改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总之，上海图书馆庋藏的这部《会编》因有彭元瑞题跋提供的明确信息，知其为四库覆校底本，并完整保存了平恕、陈崇本二人所做的删改笔迹，这在目前所知四库底本诸书中是十分罕见的。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考察乾隆五十二年覆校《四库全书》的具体操办流程，而且对于研究四库馆臣民族语名改译和违碍文字改窜两方面的问题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下文将分别予以论述。

二、《四库全书》改译工作的类型分析

我们知道，清修《四库全书》对辽、金、元时期的民族语人名、地名、职官名做了全面系统的改译工作。③ 清高宗认为“前史所载辽、金、元人地官名，率多承讹袭谬，展转失真，又复诠解附会，支离无当，甚于对音中曲寓褒贬，尤为鄙陋可笑”，④ 遂下令全面改译辽、金、元三史，并重新编订《三史国语解》。这个工作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开始，至四十六年十月辽、金、元三史全部改译完毕，四十七年二月《三史国语解》编纂完成，此后这两项工作实际又继续进行，迟迟未能定稿，先后延续十多年之久。⑤

---

① 按前引邓广铭、刘浦江合撰《〈三朝北盟会编〉研究》一文已对《会编》何以成为“四库底本”的问题有所论述，然而梁太济后又撰文质疑此书并非“四库底本”(《〈三朝北盟会编〉许刻本卷首彭元瑞题识志疑》，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编:《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712-717 页），笔者并不认同梁文之说，详细论证参见邱靖嘉:《〈三朝北盟会编〉四库覆校底本考辨——兼论乾隆五十二年覆校〈四库全书〉的操办流程》。

② 《礼部尚书纪昀奏请将文渊阁翻译册档移送热河一分等事折》，《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2081-2082 页。

③ 参见何冠彪:《乾隆朝重修辽、金、元三史剖析》，《蒙古学信息》1997 年第 1 期。

④ 《清高宗实录》卷 898，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戊寅。

⑤ 参见刘浦江:《从〈辽史·国语解〉到〈钦定辽史语解〉——契丹语言资料的源流》，第 185-191 页。

改译三史期间正值编修《四库全书》之时，当时高宗明确要求全面改译辽、金、元三史。[①] 至于其他涉及辽、金、元三朝人事的诸多史籍，四库馆臣早已意识到也应该参照重订中的《三史国语解》对他书所见民族语名做相应的改译。如三十八年四库开馆之初，总裁官于敏中在写给总纂官陆锡熊的一封手札中提到："'赡思'作'沙克什'即可照用，但似须注'旧作赡思，今从《元国语解》改正'，似为更妥，酌定。"嗣后，又有一札称"'沙克什'既于提要内声明，自毋庸另注"。[②] 这里说的是，《河防通议》的作者元人赡思，于敏中指出当依据新编《元史国语解》改译为"沙克什"，并出注说明，后来馆臣的处理方式是在该书提要中声明这一人名改译，正文中则径改不出注，于敏中对此表示认可。[③] 四十年五月，高宗又连发上谕，指示《明纪纲目》"所载青海朵颜等人名对音，沿用鄙字，与今所定《同文韵统》音字及《改正辽金元国语解》未为画一"，[④]"又《明史》内于元时人地名对音讹舛，译字鄙俚，尚沿旧时陋习，如'图'作为'兔'之类，既于字义无当，而垂之史册，殊不雅驯。今辽、金、元史已命军机大臣改正另刊，《明史》乃本朝撰定之书，岂转可听其讹谬"，[⑤] 表示要按新编《元史国语解》统一译改《明纪纲目》《明史》之类书中的蒙元人地名。由此看来，四库馆臣对辽、金、元三史以外诸书似乎也做了系统改译。但在实际办理过程中，各书改译的程度及具体做法差别很大，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责令专办，彻底改译，并编有《国语解》。如上所述，高宗已明令全面改译辽、金、元三史，故此三史所见民族语名改译得相当彻底，且其成果被汇辑为《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单独成书。与此类似的还有《契丹国志》《大金国志》二书。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当第一份文渊阁《四库全书》即将全部抄缮完竣之际，高宗抽查《契丹国志》时发现此书"体例混淆，书法讹舛"，内容多有"乖谬"，遂命馆臣改纂《契丹国志》。[⑥] 此时辽、金、元三史已改译完毕，《三史国语解》也即将编成，所以四库馆臣在对《契丹国志》进行改编的过程中，将书中契丹语词统统加以改译。[⑦] 尽管高宗上谕并没有提及《大金国志》，但因其与《契丹国志》的问题相同，故四库馆臣亦一并加以改纂，书中所见女真语词也悉数改译。同时仿照《三史国语解》之成例，将所有改译的词汇辑录为《译改国语解》一卷，分别附在重订《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书末，[⑧] 于四十九年十一月进呈。以上三史、二志因专记辽、金、元史事，且有高宗谕令，遂皆委派专人办理，改译得最为彻底。

第二，交对音官改译。除上述三史、二志外，对于其他涉及辽、金、元三朝史事的诸多书籍之改译，则交给四库馆中的对音官负责处理。如《永乐大典》辑本《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的改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总裁于敏中曾明确交代"《通鉴长编》应改辽人及西夏部族名，

---

① 《谕内阁嗣后所办各书遇本朝人名著各馆总裁等详考〈实录〉为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 810 页。

② 于敏中《于文襄公手札》第 12、13 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22 辑影印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 年，第 26-27 页。据陈垣跋《书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后》，于敏中手札均作于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之间，第 12、13 函胡适考定当作于三十八年六月（《跋〈于文襄手札〉影印本》，《胡适全集》第 13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532 页）。

③ 今文渊阁本《河防通议》书前提要即注明"案'沙克什'原本作'瞻思'，今改正"，而正文径改。

④ 《谕内阁将〈明纪纲目〉改纂其原书著查缴》，《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 390 页。

⑤ 《谕内阁改编〈明纪纲目〉著仿照〈通鉴辑览〉办理并查改〈明史〉对音讹舛之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 394 页。

⑥ 《谕内阁〈契丹国志〉体例书法讹谬著纪昀等依例改纂》，《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1418-1419 页。

⑦ 参见刘浦江：《从〈辽史·国语解〉到〈钦定辽史语解〉——契丹语言资料的源流》，第 192 页。

⑧ 《钦定重订契丹国志》卷 28《译改国语解》及《钦定重订大金国志》卷 41《译改国语解》，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383 册，1986 年。

即交办《国语解》大臣办”，[①] 此处“办《国语解》大臣”即指馆中负责民族语名改译的对音官。[②]《通鉴长编》的四库底本今藏于湖南图书馆，通过这个本子，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对音官改译的具体操作细节。[③] 不过，这种由对音官改译的做法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对音官或因任事不专，加之初修《四库全书》时改译要求可能并不严格，所以往往改得很不彻底，留有许多民族语名未改，例如《通鉴长编》就普遍存在文渊、文津阁本起初未改而于其后覆校时挖改的情况。其二，当时因辽、金、元三史的改译工作尚在进行之中，许多译名并未最终确定，对音官改译他书所采用的是某一阶段的一种译法，往往会与后来译定的写法有所出入。譬如上文提到，“赡思”改译为“沙克什”，而文渊阁本《元史》本传及《钦定元史国语解》皆改译作“舒苏”，[④] 译音差异颇大。

第三，因仍旧文，未作改译。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二日，监察御史祝德麟奏言：

> 皇上典学粹精，用心正大，敕命馆臣将辽金元三史人、地、官名详加厘正。臣于乾隆四十六年编修任内，经总裁八阿哥奏充纂修，偕在事满汉各员逐卷改译，并辑成《三史国语解》恭呈乙览，仰蒙钦定，从此昭示来兹，永为信史。因思《四库全书》乃皇上文思广运，集千古之大成，所有各书中关涉辽、金、元三朝事迹，不独史部所载繁多，子、集二部当亦不少，允宜遵照《三史国语解》一律改正。惟当日纂办之时，以三史各名尚未译定，无凭照改，大率俱从其旧。现奉谕旨，命尚书以下大小各员分勘文渊等阁四库书籍，日有程课，字字行行均须寓目，似宜趁此校阅之际，遇有三朝人、地、官名，即签出某书、某卷、某页、某行，详登档册，既可省将来一番寻检之烦，并不虞于疏漏。[⑤]

祝德麟于四十六年任翰林院编修，参与辽、金、元三史改译工作，并熟悉《四库全书》修纂情况。他指出史、子、集三部中皆有许多关涉辽、金、元三朝事迹的书籍，当日纂办时因三史之民族语名尚未译定，所以大多“俱从其旧”。这一情况此前似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其实，在编修第一分《四库全书》时，固然有一部分史籍已遭改译，但还有很多相关书籍可能完全没有改动，抑或仅有少量译改，大多译名一仍其旧。直至五十二年覆校文渊、文源阁全书，祝德麟才奏请借此校阅之际，将诸书“遇有三朝人、地、官名”者，逐一签出，遵照《三史国语解》一体改正。高宗随即应允这一建议，命武英殿刊刻《三史国语解》，“令校书各员随时签出，挖改画一”。[⑥] 由此推断，今文渊阁本诸书有关三史民族语名之改译，可能有很多都是晚至五十二年覆校时所改的。例如《元朝名臣事略》一书，有档案明确记载，“查《元朝名臣事略》内所有人名俱经改正之处，系五十二年覆校文渊阁书籍时”。[⑦] 从本文所讨论的《会编》四库覆校底本来看，因书前有彭元瑞题跋，清楚交代了他命平恕、陈崇本删改《会编》之原委，并提及二人工作内容之一即为“对音改从《钦定国语解》”，可知《会编》这部重要的宋代史籍似应与《元朝名臣事略》类似，于初修《四库全书》时皆未改译名，至此方据《三史国语解》彻底改译。据笔者检核，文渊阁本《会编》所改译名与《钦定三史国语解》是高度一致的，即可为明证。

以往学者研究涉及某些书籍四库底本的改译问题，多因书中改译文字的书写年代无法判定，以致相关讨论难以深入。而上海图书馆藏《会编》四库覆校底本则可为我们研究四库馆臣的改

---

① 《于文襄公手札》第 31 函，第 64 页。此函当作于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十七日（参见胡适《跋〈于文襄手札〉影印本》，第 535 页）。

② 关于“对音官”的情况，参见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388 页。

③ 参见苗润博：《〈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底本之发现及其文献价值》，《文史》2015 年第 2 辑，第 221-243 页。

④ 《元史》卷 190《舒苏传》，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295 册，第 544 页上栏；《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之《钦定元史语解》卷 15，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296 册，第 447 页下栏。

⑤ 《掌湖广道监察御史祝德麟奏请将〈三史国语解〉刊刻完竣呈览折》，《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2018-2019 页。

⑥ 《寄谕八阿哥永璇等将武英殿所刻〈三史国语解〉赶紧刊刻完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2020 页。

⑦ 《军机大臣奏查〈元朝名臣事略〉人名俱经改正情形片》，《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2172 页。

译工作提供一个年代可靠且内容丰富的文献样本，同时亦可对考察他书四库底本的改译时间提供一些参考。例如陈晓伟注意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庙学典礼》四库底本卷首有一篇《〈庙学典礼〉应翻译者》，列有 32 条改译书中所见蒙古语名的条目，其所改译名与《钦定元史国语解》密切相关，遂认为此系修《四库全书》时的“办《国语解》大臣”所为。① 然而根据《会编》的情况来看，四库馆臣改译女真语词汇时多有附加说明，譬如卷三“辣撒”条谓“改作郎色，满洲语邋遢也，旧作辣撒，今改”；“蒙山”条谓“改作穆克珊，满洲语梃也，旧讹蒙山，今改”，另有“蒙霜”条称“改作穆克珊，解见上”。这些改译条目的写法与《〈庙学典礼〉应翻译者》较为相似，所以笔者怀疑这篇《应翻译者》有可能是乾隆五十二年覆校《庙学典礼》时详校官签出的应翻译条目，故与《钦定元史国语解》之译例基本相同。由此可以体现《会编》覆校底本在研究四库改译问题方面的独特价值。

三、四库馆臣删改违碍文字的尺度变化

清修《四库全书》对前代文献涉及胡虏夷狄等违碍内容进行删削改窜的情况是十分普遍的，致使众多四库本书籍面目全非，后人莫不痛惜。关于清人此类讳改之详情，前辈学者已做过很细致的实例分析。如今存《旧五代史》系四库馆臣《永乐大典》辑本，此书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四库馆臣凡遇胡虏夷狄等字“莫不改易或删除”，已失“薛史”真本之旧，陈垣遂作《〈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特著其忌改之例，以发起覆”。② 后来，陈智超、梁太济又分别撰文指出四库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的种种改窜情形，展示了更为丰富多样的讳改例证，③ 其他学者在讨论某些四库本书籍时也常论及于此。从前人总结的这些讳例来看，清人改窜得相当彻底，不仅将中原王朝直接指称周边民族的胡虏夷狄等字眼删改殆尽，而且就连中原王朝的许多自称如中国、中华、华夏、诸夏等词亦遭改易，更有甚者，诸如捕虏赏格、胡谷寨、亡辽录、穷寇莫追、狼子野心、虎狼之怒等等与夷狄毫不相干的专有名词或习惯用语，也因馆臣认为可能有影射触讳之嫌而遭窜改。不过，尽管我们已对《四库全书》讳改的总体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但说起清人改窜前代文献，我们大多以为是自四库开馆之后便一直严格执行。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初修《四库全书》时，馆臣对于各朝代书籍违碍文字的删改尺度有所不同，这一点前人鲜有措意，笔者可结合《会编》的办理情况试作阐析。

我们知道，清朝统治者十分忌讳明清鼎革之史事，且尤为忌惮汉人著述宣扬反清思想。故自康雍以来，清廷对明末清初人著作查禁得相当严格，往往捕风捉影，屡兴大狱，杀戮甚众。乾隆朝更是清代文字狱最为鼎盛的时期，文网尤其严密，文祸发生最多。高宗诏令征集天下书籍，编纂《四库全书》，暗含有寓禁于征的目的。四库开馆不久，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初五日，高宗谕令各省督抚严厉查办违碍书籍，即谓“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并对各省已经进到之书，“现交四库全书处检查，如有关碍者，即行撤出销毁”。④ 其后，四库馆总裁于敏中秉承高宗旨意，指示总纂官纪昀“查检明末诸书，宁严毋宽，

① 陈晓伟：《〈庙学典礼〉四库底本与四库馆臣改译问题》，《民族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② 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刘乃和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445-483 页。

③ 陈智超：《四库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发覆》，《社会科学战线》1987 年第 3 期；梁太济：《〈要录〉库本避忌讳改考实》，梁太济：《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248-310 页。

④ 《寄谕各督抚查办违碍书籍即行具奏》，《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 240 页。

最得要领”。[①] 因此，禁毁“明末野史暨国初人所著悖谬各书”，[②] 是各省督抚和四库馆的一项重点任务，由此引发了许多宗文字狱案，株连甚广。[③] 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四库馆臣对于明末清初人著述的查禁及其关碍满清文字的删改自然是严格执行，生怕遗漏而获罪。于敏中所谓“宁严毋宽”，正是四库馆臣改窜此类书籍时奉行的基本原则及办理心态的真实写照。

然而对于明末以前的书籍，高宗的态度却颇为不同。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高宗令各省督抚严厉查禁明末清初“悖谬各书”的同时，又宣谕，征集遗书“即或字义触碍，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不必过于畏首畏尾，朕断不肯因访求遗籍，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④] 意思是说若某些书虽然也有涉及胡虏夷狄等“字义触碍”的内容，但其所指非近时明清间事，而属于“前人偏见”，则不必过于紧张，不会因此罪及藏书家。这一类书籍指的应该就是明末以前的文献，主要包括宋人指斥辽金、元至明初人记述蒙元史事的典籍。对于此类书籍的处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高宗上谕有所交代，“他若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诋詈者，自当从改，其书均不必毁”。[⑤] 这其实可以代表处理宋元至明前期书籍的一般性原则。高宗认为，此类文献记载若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应当加以删改。其一为有“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大概是指明显有悖常理的讹误不实记载当予删去。如军机处查《朝鲜史略》“所纪金朝初兴时事，亦语涉舛谬，现拟加删节抄存”，[⑥] 即属此例。其二为“涉于诋詈者，自当从改”，说的是激于狭隘的华夷之辨思想，对辽、金、元北族政权肆意谩骂诋毁的不当言论。例如，高宗发现《御批通鉴纲目续编》内附明人所作《发明》《广义》各条，“于辽、金、元三朝时事多有议论偏谬及肆行诋毁者”，遂要求“《发明》《广义》内三朝时事不可更易外，其议论诋毁之处，著交诸皇子及军机大臣量为删润，以符孔子《春秋》体例”。[⑦] 除这两种情况以外，至于时人屡屡以胡虏夷狄等字眼指称契丹、女真、蒙古等异民族，高宗似乎并不在意，非但没有要求改窜这些文字，反而谕令夷狄等字毋庸改易。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高宗上谕云：

> 前日披览四库全书馆所进《宗泽集》，内将“夷”字改写“彝”字、“狄”字改写“敌”字。昨阅《杨继盛集》内，改写亦然。而此两集中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夷、狄二字屡见于经书，若有心改避，转为非理。如《论语》“夷狄之有君”、《孟子》“东夷、西夷”，又岂能改易，亦何必改易！且宗泽所指系金人，杨继盛所指系谙达，更何所用其避讳耶？因命取原本阅之，则已改者皆系原本妄易，而不改者，原本皆空格加圈。二书刻于康熙年间，其谬误本无庸追究。今办理四库全书，应抄之本，理应斟酌妥善。再誊录等草野无知，照本抄誊，不足深责，而空格则系分校所填，既知填从原文，何不将其原改者悉为更正？分校、覆校俱系职官，岂宜失检若此？至总裁等身为大臣，于此等字面尤应留心细勘，何竟未能逐一校正？其咎更无所辞，非他书总核记过者可比。所有此二书之分校、覆校及总裁官，俱即著交部分别议处。除此二书改正外，他书有似此者，并著一体查明改正，并谕该馆臣嗣后务悉心详校，毋再轻率干咎。[⑧]

高宗在翻阅四库进呈书时注意到，《宗泽集》和《杨继盛集》内既有将“夷”“狄”二字改

---

① 《于文襄公手札》第45函，第102页。此函当作于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十五日（参见胡适《跋〈于文襄手札〉影印本》，第536页）。

② 《安徽巡抚闵鹗元奏查出悖谬各书分别办理缘由折》，乾隆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1117页。

③ 关于编修《四库全书》期间禁书与文字狱的详细情况，参见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40-100页。

④ 《寄谕各督抚查办违碍书籍即行具奏》，《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239页。

⑤ 《谕内阁明人刘宗周等书集只须删改无庸销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554页。

⑥ 《军机大臣奏遵查〈高丽史鉴〉等书情形并将〈朝鲜史略〉粘签进呈御览片》，《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431-1432页。

⑦ 《谕内阁将〈御批通鉴纲目续编〉议论诋毁处交皇子等删润粘签进呈》，《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675-1676页。

⑧ 《谕内阁〈宗泽集〉等书内“夷”“狄”二字毋庸改易并将其总裁等交部分别议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751-752页。

写为“彝”“敌”者，又有未改者，不尽统一，取其所据康熙刻本核对，方知凡改字者均为原刻本已改，而未改者原刻本故意空格加圈，四库分校官则填补阙字作“夷”或“狄”。高宗认为康熙刻本无论改字还是空格，皆属“谬误”，并明示“夷”“狄”二字毋庸改易，其理由有二：一是此二字屡见于经书，不必改；二是宗泽、杨继盛文集所称的夷狄分别指金人和谙达（即俺答）汗，并不犯忌，勿需避讳。于是高宗对此二书之分校、覆校及总裁官均做了处罚，要求将“其原改者悉为更正”，即恢复“夷”“狄”本字，其他书中有类似情况亦一体查明改正。此封上谕可证，高宗并不忌讳前人称辽、金、元为夷狄，四十七年他在指出《御批通鉴纲目续编》的问题时，又说：“至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① 可见在他看来，蛮、夷、戎、狄系表示方位之辞，毋庸讳改，这一表态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其实，高宗上述这番见解应是受其父世宗的影响。自清初以来，文网渐严，文字之狱屡兴，在这种残酷的社会氛围之下，士人撰述或刻印书籍时为求自保，往往会刻意回避胡虏夷狄等有可能触犯时忌的字眼，所以上文提到的康熙刻本《宗泽集》《杨继盛集》，便径改“夷”“狄”二字为“彝”“敌”，或作空格。② 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世宗专发上谕谈论这个问题，谓“朕览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声，如以‘夷’为‘彝’，以‘虏’为‘卤’之类，殊不可解。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义，不敬之甚者也”。其下世宗阐述了一番“中外一家，上下一体”的道理，以批驳汉人传统的华夷观念，并具体解释“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自古圣贤不以为讳也”，又“汉唐宋元明，边烽不息，每于不能臣服之国指之为虏”，则“虏”字只是敌对势力之间互相谩骂的一个称呼而已。最后世宗总结说“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删改夷虏诸字以避忌讳”的做法反而犯了大不敬之罪，因此他下令“嗣后临文作字及刊刻书籍，如仍蹈前辙，将此等字样空白及更换者，照大不敬律治罪。各省该督抚学政有司，钦遵张揭告示，穷乡僻壤，咸使闻知”。③ 大概正是由于先前世宗已有此明谕，故高宗针对四库馆臣沿袭康熙刻本避讳夷狄字样的问题重申乃父之说，明确表示宋至明初文献不必改易夷狄等字。事实上，在清代文字狱中也确实没有因前代史籍指称辽、金、元为夷狄而获罪的案例。

高宗对明末以前诸书这种较为宽容的态度，使得四库馆臣对于这部分书籍违碍文字的处理远较明末清初“悖谬各书”宽松许多。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开馆之初，总裁于敏中或已揣摩圣意，其为校办遗书拟定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旧书去取，宽于元以前，严于明以后”，④ 指的就是对上述两类图书文献的不同办理尺度。三十九年八月，高宗谕令严查违碍书籍后，于敏中随即指示纪昀“查检明末诸书，宁严毋宽，最得要领”，同时又说“至南宋、明初人著作，字面粗暴者，止须为之随手删改，不在应毁之列，此又不可不稍示区分”。⑤ 在他看来，宋至明初诸书须与明末清初之书区别对待，后者查禁自当“宁严毋宽”，而前者只需“随手删改”所谓“字面粗暴者”即可，盖指涉及辽、金、元的谩骂诋詈内容，原书不必毁去，其查检要求明显低于前者。几天后，于敏中再次叮嘱纪昀，对于明人文集语涉干碍、狂悖的文字内容“必应详细

---

① 《谕内阁将〈御批通鉴纲目续编〉议论诋毁处交皇子等删润粘签进呈》，《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676页。

② 关于《宗泽集》康熙刻本的具体改易情况，参见点校本《宗泽集》前言（黄碧华、徐和雍编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5页）。此处《杨继盛集》指康熙三十三年刻本《杨忠愍公集》，书中确有多处空格，并以方框圈出。另，康熙刻本《东莆先生文集》也存在与此类似的情况，参见黄挺：《〈东莆先生文集〉版本考》，华南师范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岭南文化研究所编：《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第1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83-184页。

③ 《清世宗实录》卷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④ 《于文襄公手札》第20函，第40页。此函当作于乾隆三十八年，具体月日不详，或在八月初（参见胡适《跋〈于文襄手札〉影印本》，第533页）。

⑤ 《于文襄公手札》第45函，第103页。

留神妥办”，言辞恳切，至于“南宋、明初之书”则仅称“如字迹有碍，分别另办足矣”，[①] 似乎显得轻描淡写。由此可见，当时四库馆臣对于明中叶前后书籍的处理标准截然不同。总体而言，其对宋至明前期文献的查检删改不如明末清初各书严格，以至上文提到某些书所据底本因清初避讳胡虏夷狄而留空之处，分校官则直接填补夷狄等本字，加之四十二年十一月高宗又有毋庸讳改夷狄的旨意，更显编修《四库全书》时对此类书籍的处理相当宽松。

具体来说，《会编》的办理情况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乾隆四十年，于敏中向总纂言陆锡熊谈及《会编》的处理意见，谓“《北盟会编》历来引用者极多，未便轻改，或将其偏驳处于《提要》声明，仍行抄录似亦无妨”。[②] 邓广铭、刘浦江合撰《〈三朝北盟会编〉研究》一文已指出，后来收入《四库全书》中的《会编》大概就是遵照于敏中的意见，没有对当时的底本“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做什么改动，便径直抄入文渊阁《四库全书》，此后陆续缮录完成的其他六阁全书，也都是照此办理的。[③] 上文提到，今文津阁本《会编》于乾隆五十二年覆校时未遭彻底删改，其中仍保留了一些违碍语句的原文，这些应是四十九年文津阁本《会编》抄成之初的面貌，说明编修《四库全书》时的确未对《会编》做大的改动，凡胡虏夷狄等文字盖大多一仍其旧。这种情况如果单独来看，不免令人感到诧异，但若置于上文所述四库馆臣对明末以前诸书处理尺度相对宽松的背景之下，我们便不难理解了。

然而四库馆臣办理明末以前书籍这种比较宽松的风气，至乾隆五十二年覆校《四库全书》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上文可知，是年五月，高宗发现文津阁《四库全书》中“讹谬甚多”，大发雷霆，严厉斥责四库馆臣，处罚了相关编修人员，并命令限期覆校文渊、文源两阁全书。高宗所说的“讹谬”包括抄写错字、误写庙讳、错乱简编、缮写荒谬、语句违碍等多种情形。其中，关于语句违碍的问题，高宗并未挑明，但从此前后发生的文字狱案来看，主要指的还是《四库全书》收录明末清初人著述仍存有悖逆言论、禁毁不彻底的问题，故纪昀即谓“最防违碍者多在明季、国初之书”。[④] 尽管此时并无迹象表明高宗也要求全面删改明末以前书籍中的违碍文字，但在皇帝震怒之下，四库馆臣无不“惶骇战惧”，[⑤] 惴惴不安，戒惧过甚，为求避祸免灾，遂一改此前校办宋至明初诸书讳改宽松之风，转而亦对此类书中的胡虏夷狄等字眼以及其他可能触讳的违碍内容进行严格彻底的删改。今所见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就是经此覆校全面讳改后的产物，如《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重要的宋代史籍均已全遭窜改。《会编》也不例外，据上文所述《会编》四库覆校底本彭元瑞题跋可知，主持覆校事宜的副总裁彭元瑞明确要求平恕、陈崇本“删其偏谬之辞”，恐怕主要针对的就是文字违碍问题。从此本来看，平、陈二人删削改窜得可谓相当彻底，不但一般常见的胡虏夷狄等字词被删改殆尽，几无遗漏，甚至对一些专名和习语亦加删改，[⑥] 就连复核人员都觉得似乎矫枉过正，未予采纳。譬如卷一“国初时女真常奉贡”句，“奉贡”改作“遣使来”，又“天祚下诏亲征女真”句删去“女真”二字，类似这样的例子今文渊、文津阁本皆仍旧未改。质言之，平恕、陈崇本的这种做法正是覆校《四库全书》时馆臣戒惧避畏心态的一种真实反应，讳改“宁严毋

---

① 《于文襄公手札》第 46 函，第 104-105 页。此函当作于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参见胡适《跋〈于文襄手札〉影印本》，第 536 页）。

② 《于文襄公手札》第 49 函，第 110 页。此函当作于乾隆四十年八月廿九日（参见胡适《跋〈于文襄手札〉影印本》，第 540 页）。

③ 邓广铭、刘浦江：《〈三朝北盟会编〉研究》，《辽金史论》，第 396-397 页。不过，后来在乾隆四十六年所上《会编》提要内并未指出书中记载的偏驳之处。

④ 《礼部尚书纪昀奏沥陈愧悔并恳恩准重校赔缮文源阁明神宗后诸书折》，《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2024 页。

⑤ 《礼部尚书纪昀奏沥陈愧悔并恳恩准重校赔缮文源阁明神宗后诸书折》，《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2023 页。

⑥ 关于具体的删改例证分析，可参见常征江：《对四库馆臣删削〈三朝北盟会编〉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

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即便对于不涉及满清的宋、元、明初文献亦复如是。

综上所述，乾隆间编修《四库全书》时，对于各书中的违碍文字馆臣删改的尺度有所不同，大致严于明末清初之书，而宽于明末以前书籍。排除个别馆臣不自觉的讳改行为因素，总体而言，宋至明初诸书记述辽、金、元三朝史事的内容应该没有遭到太大的删削改窜，直至乾隆五十二年覆校《四库全书》时才风气大变，转而不论何时代的文献，一律要求对胡虏夷狄等蔑称，以及有汉人诋毁鄙视周边民族之嫌的文字记载，进行全面彻底地删改。[①]《会编》一书因有直接的档案记载，且有一部明确的四库覆校底本完好保存至今，从而可为我们了解四库馆臣的校办讳改过程及其心态变化提供了一个绝佳范例，这是此本对于四库学研究的另一层重要意义。

最后需附带一提的是，关于清人修《四库全书》时的这种肆意改窜现象，前贤多有批判。不过，陈垣的理解有所不同，其《〈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称此举乃“效昔人改窜中秘书之故智，欲以一手掩尽天下目者，其视清朝之心实与明季诸人无异也。不过一则阳斥之，一则阴指之而已”,[②] 意谓清人改窜实为收欲盖弥彰之效，背地里指斥满清，本质上与明末抗争之士并无差别。按陈氏此文撰于 1937 年日寇入侵、北平沦陷之时，这种说法其实是为宣扬士大夫在北族王朝治下坚持抗争的政治情怀而做的有意曲解。实际上，至乾隆时代，清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念已经发生蜕变，从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场彻底转向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立场，在高宗看来，清朝与辽、金、元这些北族王朝之间没有任何传承关系，[③] 所以并不忌讳前代文献中的胡虏夷狄之称，但四库馆臣仍恐触犯时忌，于覆校时严行讳改，这应是在清朝思想钳制和文化高压政策之下催生出的一种自发性戒惧避畏行为，张元济曾评论说：“康雍以来，屡兴文字之狱。而惩羹吹齑者，遂不免多所顾忌。其‘夷’、‘胡’二字，有绝不相干者，亦一律加以删改。专制淫威，可以想见。”[④] 当所言不差。

（承蒙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提示上海图书馆藏《三朝北盟会编》四库覆校底本的重要性，在此谨致谢忱。）

References

Chang Zhengjiang. “Dui siku guanchen shanxue sanchao beimeng huibian de kaocha” (Processing of the Assembly of the Peace and War Recordings of Sanchao Beimeng Huibian). *Beijing shifan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5) 2015.

Chen Xiaowei. “*Miaoxuedianli* siku diben yu siku guanchen gaiyi wenti” (On *Miaoxuedianli* Manuscript of Qing Imperial Academy and Adapted Translation of Sikuguanchen). *Minzu Yanjiu* (Ethno-National Studies) (3) 2016.

Chen Yuan. “*Jiu wudai shi* jiben fafu” (Study on the Compiled Version of *Five Dynasties History*). Liu Naihe ed, *Zhongguo Xiandai Xueshu Jingdian Chen Yuan Juan* (Modern Academic Classics, Volume of Chen Yuan). Shijiazhuang: Hebei jiaoyu chubanshe, 1996.

Chen Zhichao. “Sikuben *Xu zizhi tongjian changbian* fafu” (Study on the Version of *Xu Zizhi Tongjian Changbian* in *Siku Quanshu*). *Shehui kexue zhanxian* (Social Science Front) (3) 1987.

Deng Guangming and Liu Pujiang. *Sanchao beimeng huibian Yanjiu* (Study on *Sanchao Beimeng Huibian*). Liu

---

① 近年来，虽已有人指出《四库全书》收录明代后期著述对直接称呼清朝为胡虏夷狄的文字做了改易，而对宋元文献称呼金、元的胡虏夷狄等字并未完全删改（韩成武、周金标：《对〈四库全书〉处理“违碍”字问题的讨论》,《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7 年第 1 期），但他们没有展开论述出现这种状况的成因，更未注意四库馆臣删改明末以前书籍违碍文字的尺度变化。此外还需说明的是，覆校《四库全书》时尽管馆臣对宋至明初文献的删改比较严苛，但由于当时校办人员少、工期紧，加之详校官校书的细致程度各有不同，故而今文渊阁《四库全书》诸书还是有许多违碍之处遗漏未改。

② 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第 483 页。

③ 参见刘浦江：《“倒错”的夷夏观？——乾嘉时代思想史的另一种面相》，刘浦江：《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7 年，第 172-203 页。

④ 张元济：《校史随笔》之《旧五代史》“清代忌讳字均删改”条,《张元济全集》第 9 卷，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第 786 页。

Pujiang, *Liaojin shilun* (Discussion on the Liao-Jin History). Shengyan: Liaoning daxue chubanshe, 1999.

Guo Bogong. *Siku quanshu zuanxiu kao* (Study on the Compilation of *Siku Quanshu*). Changsha: Yuelu shushe, 2010.

Han Chengwu and Zhou Jinbiao, "Dui sikuquanshu chili wei'ai zi wenti de taolun"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of Dealing with the Taboo Words during Compiling *Siku Quanshu*). *Tushuguan gongzuo yu yanjiu* (Library Work and Study) (1) 2007.

He Guanbiao. "Qianlong chao chongxiu liao jin yuan sanshi pouxi" (Analysis of Recompiling the History of Liao, Jin and Yuan in Qianlong's rule). *Mengguxue xinxi* (Mongolian Studies Information) (1) 1997.

Liu Pujiang. "Cong *liaoshi guoyujie* dao *qinding liaoshi* yujie: qidan yuyan ziliao de yuanliu" (From *Liaoshi Guoyujie* to *Qinding Liaoshi Yujie*: the Sources of Khitan's Language Materials). *Song mo zhi jian: liaojin qidan nüzhen shi yanjiu* (Between the Pinewoods and Deserts: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Liao-Jin and Khitan-Jurche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08.

Liu Pujiang. "Daocuo de yixiaguan?: qianjia shidai sixiangshi de ling yizhong mianxiang" (Distorted Huayi Concept?: Another Face of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the Qianjia Periods). *Zhengtong yu huayi: zhongguo chuantong zhengzhi wenhua yanjiu* (Zhengtong and Huayi: Study on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of China).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17.

Miao Runbo. "*Xu zizhi tongjian changbian* siku diben zhi faxian jiqi wenxian jiazhi" (Discover the Version of *Xu Zizhi Tongjian Changbian* used for compiling *Siku Quanshu* and its Documentary Values). *Wenshi* ((Literature and History) (2) 2015.

Zhang Sheng. *Siku quanshu guan yanjiu* (Study on the Agency of Siku Quanshu). Beijing: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2.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of Revising the Books during Compiling *Siku Quanshu* in the Qing Dynasty: Taking the Revision of *Sanchao Beimeng Huibian* as an example

QIU Jingjia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qiujingjia@ruc.edu.cn)

Abstract: When the Qing dynasty was compiling *Siku Quanshu*, almost all the included books had been revised, which contained two cases: changing the names of ethnic languages and making corrections and deletions of the suspected taboo words. In fact, the specific situations were complex. In the former aspect, during the compilation of *Siku Quanshu*, except certain books, such as the history of Liao, Jin, Yuan etc., had been completely changed the names of ethnic languages, as well as some books modified as appropriate, the rest were practically unchanged. As for the later aspect, those corrections and deletions were rigid for the books written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s, while loose for the books before the late Ming dynasty. However, until the phase of proofreading *Siku Quanshu* in 1787, the measure of revision became extremely rigorous, so that all the books concerning the periods of Liao, Jin, and Yuan had been completely modified and bowdlerized in both aspects. In this study, the version of *Sanchao Beimeng Huibian* used for proofreading *Siku Quanshu*, collected by Shanghai Library, has significant documentary values.

Keywords: *Siku Quanshu, Sanchao Beimeng Huibian,* changing the names of ethnic languages, making corrections and deletions of the taboo words